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的现状审思、热点聚焦与未来路向——基于 CNKI 核心期刊 2000—2025 年的文献计量分析

杨英歌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6)

摘 要:以 CNKI 数据库 2000—2025 年收录的 889 篇核心期刊文献为研究样本,运用 C00C9.94 文献计量软件,通过发文时序统计、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等量化方法,结合历史制度主义、类型教育理论开展质性阐释。研究发现,国内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历经迟滞起步(2000—2010 年)、指数增长(2011—2016 年)、瓶颈调整(2017—2025 年)三个演进阶段;研究热点集中聚类为职教理念与体系建构、普职融通与终身教育、内涵建设与育人实践、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数字化转型与模式创新五大核心主题。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存在层级适配性不足、融通机制不健全、育人模式滞后产业迭代等结构性困境。未来研究与实践需立足教育强国、新质生产力双重发展坐标,聚焦体系适配性优化、贯通培养立文化、育人模式创新化核心方向,深耕类型教育落地、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人才精准供给等关键领域。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类型教育;产教融合;数字化转型;文献计量

DOI: <https://doi.org/10.65196/v5rydg63>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与人力资源开发体系的重要构成,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使命,在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2019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从国家政策层面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正式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定位^[1],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进入体系化、类型化、内涵化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基本成型,截至 2022 年,全国职业学校总量达 1.12 万所,在校生规模突破 2915 万人。办学条件与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显著,中等职业教育生师比由 2012 年 24.19:1 优化至 2022 年 18.65:1,“双师型”专任教师占比由 2020 年 30.87%提升至 2022 年 56.18%;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体量持续扩容,高职院校数量由 2012 年 1297 所增至 2022 年 1489 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现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彻底打通职业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通道^[2]。

在规模扩张的背后,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仍存在结构性、制度性深层矛盾,难以完全适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产业迭代升级的时代要求。从制度运行来看,职教高考制度落地不充分,普职教育边界模糊、分流机制僵化问题依然突出;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与产业梯度人才需求适配度不足,中高本贯通培养体系尚未完全成型;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缺乏系统性制度设计,协同育人效能偏弱^[3]。从体系结构来看,职业教育内部呈现结构性分化,2012—2022 年中职学校数量由 12663 所锐减至 7201 所,十年缩减 5462 所,中职教育规模持续收缩与高职、职业本科快速扩张形成鲜明反差,折射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资源配置、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的结构性失衡^[4]。从发展质量来看,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单一、育人模式同质化、校企深度协同不足等问题,制约了体系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2024 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家精神赋能教师持续专业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4JYB008);2026 年度校级科研团队项目“生物医药产教融合创新研究”(XSTD202601)。

作者简介:杨英歌(1982-),女,硕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教人才培养。

当前学界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研究多聚焦于政策文本解读、局部实践经验总结与单一改革路径探索,缺乏对体系建设演进脉络、内在逻辑、热点迭代的系统性梳理,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化转型、教育强国建设等新时代变革诉求的回应不够充分。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以2000—2025年CNKI核心期刊文献为样本,系统剖析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的阶段特征、热点格局与演进规律,结合时代发展诉求研判未来研究路向与改革路径,以期为新时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质增效、创新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数据库,采用高级检索方式,检索主题设定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检索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文献来源限定为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初步检索得到相关文献后,通过人工筛查剔除会议综述、书评、新闻资讯、广告、重复文献及非学术研究类成果,最终确定有效研究样本889篇。将筛选后的文献题录、摘要、关键词、作者、机构等完整信息以Refworks格式批量导出,整合形成标准化数据集,为后续计量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保障研究样本的权威性、全面性与有效性。

(二) 研究方法

本文以文献计量法为核心研究方法,运用C00C9.94专业文献计量软件,对样本文献开展年度发文量统计、关键词提取、高频词统计、关键词共现矩阵构建、聚类分析与相似度测算,量化呈现国内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的时序特征、热点分布与主题格局。在量化分析基础上,融合质性研究视角,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阐释政策变迁与研究演进的内在逻辑,依托类型教育理论解析职业教育体系的结构优化路径,结合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等前沿理论剖析体系重构的时代诉求。

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的阶段特征与演进逻辑

(一) 迟滞起步期(2000—2010年):政策奠基,研究初探

2000—2010年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的萌芽起步阶段,整体研究进展平缓,学术成果积累薄弱。2000—2002年核心期刊暂无相关主题发文,研究处于空白状态;2003年张振元发表《现代国民教育初探》,首次在核心期刊开展现代职教体系相关专题研究,开启学界研究先河。2003—2010年十年间,相关核心期刊累计发文仅26篇,年均发文量不足4篇,整体呈现发文量少、研究视角单一、理论深度不足的特征,学界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议题与研究团队,仅处于基础概念探索与政策初步解读阶段。

从政策演进脉络来看,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化建设的政策布局起步较早、循序渐进。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奠定了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政策基础;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专门设置“职业教育体系”章节,以法律形式确立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法定地位,标志着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阶段;2002年《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完整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核心概念,为学界研究明确了核心议题。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主要依附于政策发布,以浅层政策解读、概念阐释为主,原创性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匮乏,但初步完成了核心概念普及与研究问题铺垫,为后续研究繁荣奠定了基础^[5]。

(二) 指数增长期(2011—2016年):政策赋能,研究繁荣

2011—2016年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的快速增长与繁荣阶段,伴随国家职教改革政策密集落地,学界研究热度持续攀升,发文量呈现指数式增长态势。其中2014年发文量达到109篇,为阶段峰值;截至2016年,六年累计发文573篇,总量为前十年迟滞期的22倍,研究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以曹晔为代表的国内职教领域核心学者,围绕现代职教体系的框架建构、内涵界定、内外关系、建设路径等多维议题开展系统性研究,研究视角不断拓展,研究内容持续丰富,初步形成多元化的研究格局。

政策密集出台是本阶段研究繁荣的核心驱动力。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构建适配产业转型、契合终身教育理念、中高职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体系建设划定核心目标。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系统明确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架构体系、重点任务与保障机制，构建起体系建设的政策框架。

在研究演进层面，本阶段实现了关键的范式转换，研究重心从传统校企合作的经验总结，转向产教融合的制度建构与机制分析。尽管政策解读类研究仍占据主流，但学界开始聚焦中高职衔接、普职沟通、体系协同发展等系统性、实践性议题，研究的问题导向显著增强。但整体而言，本阶段研究仍存在“政策跟随性”特征明显、理论自主性不足、原创性理论建构薄弱等问题。

（三）瓶颈调整期（2017—2025年）：范式转型，多维突破

2017年以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进入提质调整、范式转型的瓶颈发展阶段。领域整体发文规模有所回落，告别粗放式数量增长，转向精细化、高质量研究。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确立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倒逼学界重构研究逻辑，类型化、体系化、内涵化研究成为主流，2020—2021年发文量稳步回暖。石伟平、匡瑛、马君、祁占勇、周洪宇等知名职教学者持续深耕领域研究，推动研究重心从宏观框架搭建转向微观机制优化、从政策阐释转向学理建构，研究的深度、精度与创新性显著提升。

政策迭代持续引领研究升级。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以国家法律形式固化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地位，为体系改革提供法治保障^[6]；同年《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一体两翼五重点”战略布局^[7]，明确新时代体系改革的核心任务；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立足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明确职业教育发展的六大核心特质^[8]，为现代职教体系高质量发展划定价值坐标。

本阶段研究呈现三大标志性转型：其一，研究逻辑重构，以类型教育定位为核心逻辑起点，重新审视职业教育体系的结构功能、价值定位与发展路径，突破传统层级教育的研究桎梏；其二，研究热点迭代，数字化转型成为体系重构的新兴核心议题，数字技术赋能职教改革、重塑育人模式、优化体系架构的相关研究快速涌现；其三，研究层次升级，从单一制度分析转向系统性理论建构，学界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概念合法性、发展困境、政策变迁逻辑等开展深度学理阐释，推动领域研究从政策应用层面向理论原创层面跃升^[9]。

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的热点聚类与核心议题

本文通过计量软件对889篇有效文献进行关键词提取，共得到有效关键词1124个，关键词累计出现频次2371次。筛选出现频次≥8的26个高频关键词构建共现矩阵，结合余弦相似度测算与系统聚类分析结果，将当前国内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热点凝练为五大核心聚类。

（一）职教理念与体系建设：类型定位深化与理论范式建构

本聚类核心关键词包括类型教育、职教体制、职教理论、课程体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等，聚焦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理念溯源、学理建构与框架完善，是领域研究的基础性核心议题。理念层面，学界立足黄炎培平民职教、陶行知“学做合一”等本土职教思想，结合新时代教育改革诉求，形成核心共识：职业教育独立类型定位的确立，是我国职教发展理念的本源回归，是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前提。制度层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合法性依据、制度保障、办学定位与发展路径，成为学界持续热议的重点^[10]，补齐了职业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研究短板。

从类型教育核心视角来看，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包含内外双重结构体系：内部结构聚焦职业教育自身层级贯通，实现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各层次的衔接递进、类型互补^[11]；外部结构聚焦跨界协同，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共生、与区域产业经济的适配联动^[12]。从人才培养层级来看，各层次职教定位清晰、梯度递进：中职聚焦基础技能培育，培养通用型技能人才；高职专科聚焦核心技术赋能，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本科聚焦技术创新与复杂问题解决，培养工程型、创新型技能人才，形成梯度化人才培养体系。

理论建构层面，本聚类研究的核心突破在于实现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概念的学理化升级。马君等学者通过概念要素分析理论，从研究对象、核心意义、概念内涵、应用场域四个维度，系统论证了该概念作为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的合法性与独特性，夯实了领域研究的理论根基。但实践层面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十年间中职办学规模大幅收缩、生源质量波

动,与类型教育均衡发展的理想目标形成张力,如何将理念共识、理论成果转化为可落地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方案,仍是本领域研究需要持续破解的核心难题。

(二) 普职融通与终身教育: 学段贯通革新与终身体系搭建

本聚类涵盖普职融通、终身教育、普通教育、双向融通等核心关键词,聚焦两类教育的边界突破、机制创新与终身育人体系构建,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横向融通发展的核心研究议题。学界研究主要围绕普职融通的现实困境、本土化实施路径、制度机制设计展开,重点探索学分互认、课程互通、学籍流转、双向升学等关键制度的落地模式^[13]。

普职融通是落实类型教育定位、破除职业教育边缘化困境的关键举措,只有打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通道、架设双向互通的教育立交桥,才能真正消解两类教育的层级差异,实现职业教育的平等发展地位。新时代普职融通建设的核心转向,是从传统单一环节的局部融通,迈向全学段、全流程、系统化的深度融通:招生阶段实现学籍互通、双向流转,培养阶段实现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升学阶段依托职教高考制度实现两类教育的等值升学、多元发展。从政策变迁逻辑来看,社会文化观念的革新、教育价值认知的转变,是推动普职融通政策迭代优化的深层动因,直接影响融通制度的落地成效。

从实践现状来看,当前普职融通的落地成效仍不理想,高职院校年度中职生源录取占比不足5%^[14],双向融通的制度空间狭窄、通道不畅。从终身教育视角来看,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为终身职业体系建设提供了全新可能,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局限,推动职业教育从阶段性就业培训,转向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个性化、常态化学习服务,成为普职融通纵深发展的重要赋能抓手^[15]。

(三) 内涵建设与实践探索: 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质增效

本聚类包含中职教育、高职教育、中高职衔接、双师型教师、技术技能人才、专业群建设等关键词,聚焦职业教育内部育人体系的内涵升级、质量提升与全链条贯通,是体系纵向发展的核心实践议题。研究紧密围绕“双高计划”建设、中高本贯通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专业体系优化等核心工作,聚焦职业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的转型路径。

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一体化贯通培养体系,实现了职业教育全层级覆盖,但实践中仍存在诸多短板:各学段办学定位同质化、差异化不足,课程体系衔接断裂、培养标准不统一,实践教学体系脱节,贯通培养的系统性、连贯性较弱^[16]。从生态位理论视角分析,中高本各层级职业教育尚未形成“错位发展、梯度递进、共生互补”的良性生态格局,层级壁垒依然存在。师资建设方面,我国“双师型”教师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占比突破56%,但传统“双师型”评价体系存在维度单一的局限,仅侧重校企空间维度的跨界属性,忽视了教师专业持续成长的时间维度与育人实践的心理维度,师资队伍高质量建设仍存在理论与实践短板^[17]。

优化职业教育层次结构、畅通内部贯通通道,是本领域研究的核心落脚点。学界普遍认为,应构建职业教育专属招生评价体系,立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建立“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多元评价模式;统一各层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实训标准,破解学段衔接中的专业断层、能力脱节问题。2021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对中高本专业进行一体化顶层设计,为职业教育纵向贯通、内涵升级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成为体系内涵建设的重要基础。

(四) 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 浅层合作迈向生态协同共建

本聚类核心关键词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职教集团、人才培养,聚焦职业教育与产业、企业的协同育人机制创新,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跨界融合发展的核心支撑议题。研究重心从早期合作模式的浅层探索,转向治理架构优化、生态体系构建、制度机制完善的深度研究^[18]。

从历史演进脉络来看,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历经四个阶段迭代升级:1949—1990年为产教同构阶段,依托行政力量实现产教被动绑定;1991—2013年为产教结合阶段,正式确立“工学结合、产教结合”的基本发展模式;2014—2021年为产教融合阶段,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等创新模式广泛推广;2022年至今为产教协同阶段,依托“一体两翼五重点”战略布局,实现产教融合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当前全国已建成209个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1121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产教融合的组织载体基本成型^[19]。

实践层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仍存在明显短板,浅层化、形式化合作占比偏高,校企共生共长、深度赋能的实质性合作不足^[20]。同时,职业院校“学历教育强、社会培训弱”的结构性问

题突出,未能落实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育人服务功能不够完善^[21]。数字化转型为产教融合提质升级提供了全新路径,数字技术打破校企合作的时空壁垒,推动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流程,助力校企协同育人从形式合作走向生态共生^[22]。

(五) 数字化转型与模式创新:技术赋能驱动体系整体重构

本聚类涵盖数字化转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资源建设、数字素养、智慧职教等关键词,是新时代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创新发展的前沿热点议题。数字技术的全面渗透,彻底颠覆了传统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育人逻辑与体系架构,成为驱动职教体系现代化重构的核心动力^[23]。

数字化转型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构作用集中体现在四个维度:一是教育理念革新,从传统知识灌输式教学,转向能力培育、终身成长的育人理念;二是教学模式升级,打破线下单一教学形态,形成线上线下融合、虚拟仿真实训、智慧化教学的多元育人模式^[24];三是评价体系优化,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多元化、过程化、智能化的育人评价体系;四是教育公平提升,依托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整合全国优质职教资源,实现优质课程、实训资源、师资资源的全域共享,有效破解区域职教发展不均衡问题^[25]。

在课程体系重构层面,数字化背景下的职教课程开发需遵循五大核心原则:教育性原则,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兼顾技能培养与价值塑造;融通性原则,打破学科、学段、校企壁垒,实现资源与内容协同整合;流动性原则,适配产业技术迭代,实现课程内容动态更新;个性化原则,立足学生禀赋差异,推行因材施教、精准育人;智能化原则,依托虚拟仿真、数字交互技术,拓展育人场景与实践载体^[26]。

五、新时代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改革路向

(一) 三重逻辑转向:重塑体系高质量发展价值内核

1. 发展范式:从规模本位转向质量本位

随着适龄人口总量下降、职业教育生源红利逐步消退,依靠扩容增量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新时代职业教育必须摒弃“以量取胜”的传统思维,全面转向“以质取胜”的内涵式发展^[27]。立足类型教育定位,强化中职教育的基础性育人功能、畅通中高本贯通培养通道、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办学规模,拉长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链条、提升人才培养层级,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从依赖“人口红利”向培育“人才红利”转型,适配新质生产力对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28]。

2. 服务面向:从学龄教育转向全龄终身服务

传统职业教育以在校学龄青年为核心服务对象,聚焦职前一次性就业能力培养,服务场景单一、生命周期有限。在产业技术快速迭代、职业岗位持续更新、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新时代,劳动者终身技能迭代、岗位转型、能力升级成为常态。职业教育需突破阶段性教育局限,构建覆盖职前培养、在职提升、转岗培训、老年技能更新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29],实现从“一次性就业准备”向“终身技能赋能”的根本性转变,全面服务社会人力资源持续升级。

3. 治理逻辑:从单一管控转向多元共治

传统职教治理以政府单一主体为核心,依托行政指令推进改革,适配静态化、单一化的发展环境。新时代职业教育跨界属性凸显,涉及教育、产业、企业、社会多元主体,利益诉求多元、发展环境动态多变。职教治理必须构建多中心共治格局,推动政府从指令管理者转向制度设计者、规则监督者、矛盾协调者,充分激活行业、龙头企业、职业院校、第三方机构的主体活力,通过资源共享、协同协商、利益共建,形成多元协同的现代化治理体系^[30]。

(二) 四项制度突破:夯实体系高效运行实践根基

1. 优化职教高考制度,筑牢类型教育平等根基

职教高考是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的核心制度支撑,是构建普职平等格局的关键抓手。针对当前职教高考普职界限模糊、考核体系不科学、社会认可度低等问题,需持续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核模式,强化技能考核的标准化、规范化、权威性,构建适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的专属招生评价体系。通过制度优化彻底扭转“低分读职教”的社会偏见,打造与普通高考等值、

并行、互通的多元化成才通道。

2. 完善层级结构体系，畅通纵向贯通培养通道

坚持“中职为基础、高职为主体、职业本科为牵引”的层级发展格局，稳步扩容职业本科教育，择优推动优质高职院校升格转型。同步完善中高职、高职与职业本科的贯通培养机制，统一各学段培养目标、专业体系、课程内容、实训标准，破解学段衔接断层问题，构建梯度清晰、衔接顺畅、覆盖完整的“中—高—本”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链条。

3. 深化“三融”系统改革，激活跨界协同发展动能

以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为核心路径，全方位完善体系协同机制。普职融通层面，推进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制度化，健全学分银行、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机制，打通两类教育双向流动通道；产教融合层面，以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载体，落实财税、土地、金融、信用组合激励政策，建立政策落地监测评估机制；科教融汇层面，构建职业院校应用型科研评价体系，引导科研创新对接产业链、创新链，实现科教精准赋能。

4. 健全多元评价体系，树立科学育人导向

破除单一化、唯论文、唯分数的传统评价模式，以立德树人、社会贡献、人才质量为核心评价导向，引入增值评价、过程评价、多元主体评价。将企业行业认可度、学生发展质量、校企合作成效、社会服务贡献纳入评价体系；改革教师职称评审与考核机制，弱化论文指标权重，强化教学实绩、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等实践贡献，构建适配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评价体系。

六、结语

本文基于 2000—2025 年 CNKI 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梳理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的演进脉络、热点格局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国内相关研究历经迟滞起步、指数增长、瓶颈调整三个阶段，形成五大核心研究热点聚类，整体研究实现了从政策解读到问题诊断、从制度分析到理论建构、从效率主义到生命主义的深层范式转型，领域研究的学理性、系统性、前瞻性持续提升。

展望未来，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研究需立足教育强国与新质生产力要素跃升双重坐标，以类型教育定位为根本遵循，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赋能，持续推进体系适配性优化、贯通培养立体化、育人模式创新化。从落地实践看，东部地区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以产教融合联合体与数字化转型先行示范，中西部如贵州清镇职教城则以省域统筹、园区集聚破解资源约束；各地宜立足区位禀赋与产业基础择取适配方案、精准落地。推动职业教育体系从层级划分走向类型赋能、从制度覆盖走向治理高效、从效率优先走向生命关怀，着力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产教共生、适配产业、彰显特色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人才自主培养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 [1] 姜大源. 跨界、整合和重构：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三大特征[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9 (7): 10-12.
- [2] 数说“职业教育这十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向纵深发展[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 45 (3): 74-76.
- [3] 李东航.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四个着力点[J]. 职业技术教育, 2023, 44 (18): 1.
- [4] 王兴. 职业教育中高本一体化的生态位研究：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26, (6): 37-45.
- [5] 施南奇, 阙明坤.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政策的演进历程、变迁逻辑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4, (33): 24-33.
- [6] 陆俊杰. 类型教育视野下职业教育的理念回归与特色超越[J]. 职业技术教育, 2020, 41 (19): 22-28.
- [7] 祁占勇. 加快建设产教融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践逻辑[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 46 (16): 1.
- [8] 沈中彦, 孙丹. 面向教育强国“六大特质”：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25, (6): 14-22.
- [9] 马君, 莫佳佳.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J]. 职教论坛, 2026, 42 (5): 5-14.

- [10] 瞿连贵,邵建东,王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视域下职业本科招生吸引力的提升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26,20(4):87-95.
- [11] 王素霞.优化类型定位推进职业教育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26):91-96.
- [12] 高鸿,赵昕.基于类型教育特征的职业院校教材建设思路探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08):15-19.
- [13] 周洪宇,张秋梅.加快建设职普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背景、内涵与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13):5-13.
- [14] 朱秋月,李星雨.空间协同视角下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逻辑、困境与可为路径[J].职教论坛,2026,42(6):13-21.
- [15] 杨岭.职业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的路径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0,41(04):48-53.
- [16] 毕树沙,罗源.我国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系统审视与路向展望[J].职业技术教育,2026,47(9):9-15.
- [17] 徐平利,李聪莉.适应新质生产力: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亟待破解五大命题[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4,42(11):137-142.
- [18] 宁锐,米靖,王珩安.我国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的历史脉络、时代逻辑与创新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5,(9):30-37.
- [19] 申守权,孟凯,王哲.破局首役: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J].职业技术教育,2024,45(36):7-13.
- [20] 向罗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第三方评价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1(02):49-53.
- [21] 李莹,闫广芬,李国印.基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职教论坛,2025,41(11):124-128.
- [22] 全宣文,杨柳青.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基于首轮“双高计划”56所建设院校的面板数据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25(07):17-23.
- [23] 王莹,曹莉.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体系重构路径研究[J].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6,45(5):80-84.
- [24] 曲霞,郑治伟,张毅哲.赋能新型劳动者培养的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探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07):60-66.
- [25] 黄旭中,安妮,向荣.数字化转型视域下职业教育信息化效果评估——基于湖北省高职院校的实证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4(09):39-46.
- [26] 马晓慧,周保平.“类型教育”背景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10):48-53.
- [27] 陈鹏,李小文.人口变动背景下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逻辑转向与实践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8):5-13+53.
- [28] 匡瑛,吴君逸.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改革[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12(4):22-32.
- [29] 周德竹.中职学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思路与实现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1,42(20):63-67.
- [30] 廖波光.示范性职教集团特征分析与发展路径——基于全国第一批示范性职教集团(联盟)培育单位的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21,42(06):45-49.

Reflections, Hotspots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es on China's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CNKI Core Journals from 2000 to 2025

YANG Yingge

(Xu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Bioengineering, Xuzhou 221006, Jiangsu, China)

Abstract: 889 core journal papers retrieved from the CNKI database covering the period 2000–2025 are adopted as research samples in this paper. Quantitative analyses including annual publication statistics,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cluster analysis are performed via the bibliometric software COOC9.94, and qualitative interpretations are conducted based o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ype education theory. Three evolutionary stages are identified for domestic research on China's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e lagging initial stage (2000–2010), the exponential growth stage (2011–2016), and the bottleneck adjustment stage (2017–2025). Five core clusters are summarized for research hotspots, which are vocational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and general education together with lifelong education,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s well a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model innovation. Multiple structural dilemmas are confronted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such as insufficient hierarchical adaptability, imperfect integration mechanisms, and talent training models mismatched with industrial iteration. Dual coordinates consisting of building an education powerhouse and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taken as the basi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ree core orientations including system adaptability optimization, interconnected training overpass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model innovation are focused on, and in-depth explorations are carried out in key fields cov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ype educ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precise supply of industrial talents.

Keywords: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ype educ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ibliometrics